

中華史學 三千年史



李小樹／著

北京市特色專業項目資助課題

中國物資出版社

中華史學

三千年史

——

北京市特色专业项目资助课题

中華史
三千
年史

李小樹／著



中國物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李小树著.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0. 6

(北京市特色专业项目资助课题)

ISBN 978 - 7 - 5047 - 3403 - 7

I. 中… II. 李… III. 史学史—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929 号

策划编辑 邹绍荣

责任编辑 邹绍荣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杨小静 梁 凡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clph.cn>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 (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 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7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47 - 3403 - 7/K · 0036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本书所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天才创造与智慧结晶的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史学始终承载着十分重要的任职，人们通过史学记录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并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寻规律以感知现实、洞见未来，都是这种任职的集中体现，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视道德教化为天然使命。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①毫无疑问，这种对道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作用，它可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

与此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显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其广大成员历史知识贫乏、历史观念淡漠的民族，能够历经千载而生生不已，能够面对未来而自强不息。因而，无论任何时代，史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在广大民众文化知识的丰富、道德素养的提高、民族精神的提升、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的形成与强化，以及社会总体状态的改善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梁启超便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②梁氏的呼吁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代而言，其借鉴意义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中华史学自诞生以来，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通

^①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第7页，中华书局，1989年。



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始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职责，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学术辉煌，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文化成就。

当前，历史学科本身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同时，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历史”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史学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这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从而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在这种背景下，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而显现其“学术辉煌”的中华史学，显然需要我们去回顾与总结，中华史家在数千年中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也应当为我们所了解与承续，这是本书撰写的目的所在。

由于自西周始，有关中华史学的记载才逐步丰富和明晰，而中华史学的特质在传统史学中显现得最为突出，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谈及中国史学“最发达”时，特意强调说：“二百年前，可云如此。”^①其所指对象即为中华传统史学。为此，本书将考察的断限定为西周时期到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为止的中华传统史学。系统考察这近三千年的时间内中华史学发展变化的历程，深入探讨中华史学在制度设置、内容取向、形式选择、表述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基本特质及其宏观把握与具体操作的主要模式，包括不同时期中华史学演进的基本态势及其特征；史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史学传播在形式、内容、范围、功用等方面的变化与进展；不同历史阶段史学发展在社会文明与进步中发挥的作用；史官制度的建立与演变；史家的生平、学术活动与史学成就；史学名著的体裁、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等，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中华史学近三千年间的演化图景，把握贯穿其间的史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揭示中华史学发展的规律，继承和发扬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来自史学的资源。同时，我们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延续，以千年为时间长度对历史进行记述与研究，将成为史著撰写的一种重要方式。

李心树

2010年5月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1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目 录

导 言

文明曙光中的历史记忆

—— 中华史学的萌生与初步发展

成熟篇

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

——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中华史学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一千余年，对应着西周初建至西汉之末。其间，中华史学出现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诞生了齐太史兄弟、董狐、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卓有成就的杰出史学家，中华史学逐步走向了成熟，成为华夏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一章 西周时期的中华史学	11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历史记录和记史制度	11
第二节 中华史学中重民观念的出现	12
第三节 中华史学重鉴戒传统的形成	13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史学	15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史学的演进	15
第二节 中华史学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形成	17
第三节 中华史学中重人事的历史观	18

第三章 中华史学的早期传播	20
第一节 口头讲史与文字记史	20
第二节 不同类型的讲史活动	22
第四章 秦与西汉时期的中华史学	27
第一节 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史学	27
第二节 西汉时期中华史学的复兴	33
第五章 西汉时期中华史学的传播	41
第一节 史书的抄写、传阅与流通	41
第二节 讲史活动的发展与变化	42
第六章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46
第一节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史著	46
第二节 西汉时期杰出的中华史家司马迁	61

鼎盛篇

走向繁盛的东方学术

——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的中华史学

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的一千余年间，中华史学的发展虽然不无曲折，但总体态势的良好或曰极端良好却是不容否认的，体裁的多样、内容的丰富、史家的活跃，使这千余年间的中华史学，由此前的成熟走向了鼎盛。

第一章 新莽王朝与东汉时期的中华史学	77
第一节 新莽王朝与东汉时期中华史学的发展	77
第二节 东汉时期中华史学的传播	86
第二章 三国与西晋时期的中华史学	92
第一节 三国鼎立局面下的中华史学	92
第二节 西晋的统一与中华史学的发展	98
第三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中华史学	104
第一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华史学的繁荣	104
第二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华史学的时代特征	118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史学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123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史学的民间传播	12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史著撰修、抄写与传阅活动	12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民间授史活动与通俗历史讲唱活动	134
第五章 隋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华史学	140
第一节 统一局面下的隋代史学	140
第二节 隋王朝对史学的控制与隋代史学的沉寂	142
第六章 唐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华史学	147
第一节 唐代史学的主要成就	147
第二节 唐代政局的变化与史学的发展历程	153
第三节 官方设馆集体修史的制度化	161
第四节 唐代民间的通俗历史讲唱活动	162
第七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华史学	170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史学的衰微	170
第二节 五代十国时期史学衰落的原因	171
第八章 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177
第一节 王莽秉政至西晋时期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177
第二节 关于班固“受金”写史和陈寿“谤议”诸葛亮问题	192
第三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208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229

演化篇

盛衰嬗变中的演化之路

——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华史学

中华传统史学在公元十世纪时进入它的极盛时期，官方和民间的史学活动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兴盛。而与此同时，极盛状态的出现，也预示着衰微的即将开始，自此以后，中华传统史学随着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日益腐朽而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辉煌，走上了一条嬗变之中的演化之路。

第一章 两宋时期的中华史学	257
第一节 两宋时期中华史学的兴盛	257
第二节 两宋时期中华史学兴盛的社会背景	264

第三节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	271
第二章 辽、金、西夏统治区内的中华史学	282
第一节 契丹、女真、党项族的口传历史	282
第二节 辽、金、西夏建国后史学的长足发展	284
第三节 辽、金、西夏建国后史学发展的原因	287
第三章 元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史学	292
第一节 元代史学的成就与特点	292
第二节 蒙古族的统治对中华史学的影响	298
第四章 明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华史学	304
第一节 明代史学的成绩	304
第二节 明代史学的特点	307
第三节 明代史学之不足	309
第四节 明王朝的文化政策与史学的变化	314
第五章 清前期的中华史学	322
第一节 清前期中华史学的发展	322
第二节 清初史学的“经世”与乾嘉考据史学	329
第六章 明清时期历史的通俗传播	337
第一节 庙堂史学的局限与通俗史学的发展	337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讲唱活动	339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	342
第四节 明清通俗历史传播兴盛的背景及其影响	346
第七章 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349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349
第二节 明代和清前期的中华史家与史著	361
参考文献	378
后 记	387
编 后 记	388



导言

文明曙光中的历史记忆

——中华史学的萌生与初步发展

应当说，到西周时期，中华史学的“形态”才变得完整而清晰，但在此之前，蕴涵着一个民族历史记忆与未来理想的中华史学早已萌生并走过了它最初的历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周之后的中华史学，有必要对此前中华史学的萌生及其初始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简略的追述。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人们不断认识、改造和适应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过程。为了使自身的实践活动更有成效，更少盲目性，人类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加深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新的学科由此产生并直接为人类的实践服务。因而，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因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需要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也不例外。

早在原始社会，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对史学的需要就已经开始了。进入氏族公社以后，为了维系本氏族的血缘关系以利于氏族的发展，人们要向后代传述祖先的系谱和经历；为了加强部落联盟的团结，要向联盟内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员讲述联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了教育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使支撑氏族生存发展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承继和发扬光大，老人们要向青年人讲述氏族部落的传说、历史和氏族英雄的事迹。在世界各地，处于文字产生前原始社会阶段的各民族，都存在着这种因社会需要而进行的非文字的传授历史的活动。

生活在非洲西部森林中的原始部落，男女少年长到十三四岁时，要在部落老人的主持下举行“成丁礼”，接受几个月的教育，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听老人讲述部落发展的历史。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也有类似的习俗。^①

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亨利·摩尔根（公元1818—1881年）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了北美易洛魁人原始部落集会时所进行的口头的历史传授活动。他在该书的第二编第五章《易洛魁人的联盟》中记述说：当一个易洛魁人部落产生新首领的时候，要在氏族部落的集会上举行新首领的授职仪式。在仪式上，要由一位巫师手持被称为“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的“贝珠带”（或贝珠绳），口头传述部落联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发展史。这位“巫师”在集会上“把联盟形成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他把历史传统从头到尾全部复述一遍……使联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保持常新的概念。”^②

民族调查显示，我国很多解放前仍然保留着原始社会习俗的民族，如云

^①参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

^②（美）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五章，第137—138页，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南的佤族、景颇族、怒族、纳西族、哈尼族、瑶族等，都有口头讲述本民族历史的传统。

我国古籍中也记载着同样的情况。关于我国女真族的早期历史，便是在文字产生前以口头讲述的形式流传的。《金史·完颜勛传》记载说：“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勛及耶律迪越掌之。勛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可见，在女真文字未创制之前，女真族虽然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但祖先的事迹，民族早期的历史，仍以口传历史的形式在女真族中流传。因为有了这种口传历史，在女真文字创制出来之后，完颜勛等人通过访向女真老人，将口传历史变为文字记录，写成了关于本民族早期发展情况的历史著作——三卷本的《祖宗实录》。

由上可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都有着自己的以口头讲述为形式的非文字的口传历史。原始部落的这种口传历史事实上是一种雏形状态的历史记录，而史学萌生之初，总是以历史记录为其表现形态。

所谓历史记录，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将历史人物个人及其群体的活动，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结果等历史发展情况附着在某种载体上，使其得以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载体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记录不可能是单一形式的。史学著作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记录；历史纪录片是以现代科技手段控制的光电磁波为载体的历史记录；而口传历史则是以语言为载体，使历史发展情况得以保存和流传的历史记录。尽管口传历史有可能因“个体人”的消亡而失传，但是，它同文字记录的历史一样，包含了历史记录所必备的几个要素：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结果，等等，因而，它毫无疑问地属于历史记录。实际上，我国古代有的史学家就把这种口传历史比作后代史学常见形态的史官的文字记录。北魏著名史学家魏收在《魏书·序纪》中便说：拓跋氏的先世，“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我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在论及中华史学早期发展的历史时也说：“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部族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掬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

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口传的历史中，不仅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述，而且有对人类起源的看法，有对在生存发展中历尽艰辛的祖先的歌颂，有对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氏族英雄的赞扬。也就是说，表达了传述者的历史观点。而传述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导民众，教育后代，发挥了迄今为止史学仍然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

原始社会的口传历史既然是历史记录，又表达了传述者的历史观点，发挥了史学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口传历史称为史学。当然，这还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史学，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史学。它还有很多缺陷，还不十分完善。它还是一颗幼芽，而不是参天大树，但它毕竟是史学的幼芽。因而可以说，中华史学萌生于原始社会，其形式为原始人的口传历史。

与后代的史学相比较，萌生时期的中华史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因为当时还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因而原始社会的口传历史没有阶级性。它为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而不是为某一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二，在原始社会，人类的主要活动是为了适应大自然而求得生存，史学主要记录人类的这种经历，歌颂在其间作出贡献的人物。

其三，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备的历法，因而原始社会的口传历史在时间上还不是精确的，一般是以氏族首领或一些重大事件的先后为标志来确定时间顺序。

其四，由于原始社会经历的时间很长，发生的事件很多，而人脑的记忆是有限的，因而对历史的口头传述只能是粗线条的。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是简略的而不是详细的，记录的空间范围也是比较狭窄的。

其五，原始社会口传历史的功能主要是教育氏族部落的成员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因而其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其六，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由于原始宗教的普遍存在和影响，原始社会的口传历史中掺杂着较多的神话传说。

尽管原始社会的口传历史还有很多缺陷，还远不是完备的，更不是科学的，但它是适应当时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是充满生机的。

到夏商时期，中华史学开始了萌生之后的初步发展。关于夏朝统治时期的中华史学。夏王朝是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后建立的第一个古代王朝，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已经可以确定，中华文字的产生不晚于夏代，这就使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9页。

此前的口传历史有可能转变为文字记录，这对中华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先识篇》载，夏朝末代王夏桀在位荒淫无道，不理朝政，“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按此说法，则夏王朝已经设置了史官，保存着典籍，其中自然包括历史典籍。这是有关夏朝史官与史籍的极为重要的一条记载，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即援引此条来叙述夏王朝史官的设置情况。此外，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探讨夏代史学的大致状况。

首先，从夏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看，已经具备了设置史官的可能性。夏代已经出现了国家，有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为了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制定各种制度，也需要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因而，将所定制度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当时夏王朝维护统治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也应当有专门从事这种记录的官员——史官，应当有史官用文字记录的历史。

其次，从文献记载看，先秦史籍中常常提到《夏礼》、《夏书》，《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的话说：“《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载？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晋语四》载：春秋时期，南阳一带的“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在夏代“嗣典”中，应当有由夏朝史官记载保存并流传到后世的历史记录。此外，《史记》、《竹书纪年》等史籍清楚地记载了夏王朝的世系，共十四世，十七王，记述了一些夏王在位时的统治状况，有的记载还较为详细，实际上是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历史记录，它们很可能是夏代当时的记录辗转流传后世的。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情况看，随着国家的产生，史学不可避免地被统治阶级利用，为其政权的巩固服务。夏王朝很可能已经设置了从事历史记录的历史官，对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记载，有了关于王朝历史的文字记录。

对于夏代史学中的历史观念，虽然文献记载极为缺乏，但从流传后世的《尚书·甘誓》看，夏人对上天和祖先是极为迷信的，把讨伐敌方说成是“恭行天之罚”，如果听从命令，便“赏于祖”，这是夏人信仰上天和祖先神的宗教神灵观的表现。这种迷信上天和祖先的思想，不可能不存在于史官的历史观念里，也必然要反映在史官所作的历史记录中。从整个史观的发展过程看，这是当时历史观念的主流。

关于商朝统治时期的中华史学。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商代当时的文字记录。甲骨文的记载内容十分广泛，有关于商王朝国家机构的，如官员名称，军队数量等；有关于商王朝与各方国的关系的，如

方国的进犯，商王朝对方国的讨伐等；有关于商代社会经济的，如农田的耕作，收成的好坏，畜牧和狩猎的状况等；有关于社会阶级状况的，如被统治者的境遇、反抗等。此外，还有关于天象、气候等方面的记载，总之，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见，甲骨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研究商代历史的珍贵材料。但是，甲骨文只是商王室从事占卜这一迷信活动的记录，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它很少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因而它还不是专门的历史记录，更不是史学著作。不过，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代应当还有除甲骨文之外的其他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历史记录，即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甲骨文在对每一事件的极其简略的记录中，注重了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了历史记录的影响。

其二，周公旦在对殷人发布的文告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 这些“册典”之中，应该包括历史记录。

其三，《尚书·商书》中有《汤誓》等五篇基本可信的篇章，系当时统治者讲话和文告的原始记录，是一种流传到后世的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以文字书写方式进行记载的历史记录的雏形，它们在后代已被称为史书了。

其四，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朝长达数百年统治中所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的世系记载得十分清楚，近代以来，经学者考证基本可信。而且，《殷本纪》对不少殷王的统治状况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的还比较详细，这些记载如果没有流传下来的较为可信的文字记录的历史作为依据，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五，商朝设置从事历史记录的官员——史官，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在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关于史官名称的记载，他们被称为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北史、卿史、御史等。^② 在晚殷的铜器铭文中，也有尹、乍册等史官的名称。《吕氏春秋·先识篇》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通典·职官典》记载：“殷太史高势，见纣之乱，载其图法出奔于周。”它们与甲骨文的记录相印证，说明了商朝史官设置的可信性。

从上述五点可以看出，商代史学在夏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在历史观方面，由于商朝是进入阶级社会不久的王朝，同夏王朝一样，氏族公社时期原始宗教的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不但殷王崇信上帝和死去的祖

^①《尚书·多士》，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②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史官》，科学出版社，1956年。



先，所有事情都要求神问卜，大臣迷信天命，就是殷民也不例外。即《礼记·表记》中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史学处在这样一个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将一切都寄托于上天和祖先保佑的时代，作为史家的史官，追随的是极端迷信神鬼的君主，当时的历史观必然要受到影响和限制，神权迷信的思想极为浓厚。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包括国家的兴衰存亡，战争的发生和胜败，都邑的迁徙，历史事件的出现和结果，历史人物的命运等等，都是由上天的意志决定的。这是一种用天命来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变化的观点。

显然，西周之前中华史学虽然已经萌生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这种初始阶段的史学，由于尚不成熟，也由于时代的久远和记载的稀缺，它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幅朦胧的影像，这种影像到西周时才逐步清晰地显现出来。

